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祥宏

#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下)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

[英]埃利·哈列尔◆著

曹海军 周 晓 田玉才 孙 国◆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下)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

[法]埃利·哈列维 ◆ 著

曹海军 周 晓 田玉才 赵 闯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 / (法)哈列维著;曹海军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39-3

I. ①哲…

II. ①哈… ②曹…

III. ①功利主义—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8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306 号

##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上、下)

著 者:(法)埃利·哈列维 译 者:曹海军 周 晓 田玉才 赵 闯

责任编辑:崔文辉 于二辉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4.75 字数:4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39-3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英译本序 .....	001
导论 .....	001

## 第一编 边沁的青年时代 (1776—1789)

前言 .....	003
第一章 起源和原理 .....	005
第二章 边沁的法哲学 .....	038
1. 民法 .....	039
2. 刑法 .....	056
3. 学说与时代 .....	075
第三章 经济与政治理论 .....	094
1. 亚当·斯密与边沁 .....	094
2. 民主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 .....	124

## 第二编 功利主义学说的演进：从 1789 年到 1815 年

前言 .....	161
第一章 政治问题 .....	164
1. 反对人权宣言的功利原理：伯克与边沁 .....	164

2. 麦金托什, 潘恩和葛德文 .....	189
第二章 经济问题 .....	211
1. 援助的权利 .....	212
2. 人口原理 .....	231
第三章 边沁, 詹姆斯·密尔和边沁主义者 .....	255
1. 激进主义的诞生 .....	257
2. 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 .....	270
3. 边沁声望日隆 .....	300

### 第三编 哲学激进主义

前言 .....	317
第一章 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 .....	320
1. 李嘉图 .....	321
2. 詹姆斯·密尔与麦克库洛赫 .....	344
第二章 司法组织和国家组织 .....	381
1. 司法程序与司法组织 .....	383
2. 宪法 .....	410
第三章 思想的法则和行为的规则 .....	444
1. 知识 .....	445
2. 行为 .....	466
第四章 结论 .....	497
附录 .....	538



# 前 言

“错误 (error) 与谬误 (fallacy) 的区别很容易把握。错误仅指一种不正确的意见，谬误也是指一种不正确的意见，但这种意见是由达到目的的手段构成。”<sup>[1]</sup> 边沁 (Bentham) 在他的《政治的谬误》一书中这样写道。那么，按照边沁的观点，导致谬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每个公共人 (public man) 都始终受着两种不同利益的影响：一种是公共利益，“由他在整个社会……幸福中所分享的部分构成”；另一种是私人利益，“由他在社会的某些非主体部分分享的幸福构成”<sup>[2]</sup>。当公共人的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 (general interest) 发生冲突时，他将诉诸谬误从而必然希望维护他所属的特殊社团 (particular corporation) 的利益而反对普遍利益。改革派努力的趋向是，一方面指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毫无同一性，同时又力图实现这种同一性。统治社团 (Governing corporation) 成员则力图让人们相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的同一性早就存在了。团结在边沁和詹姆斯·密尔 (James Mill) 的旗帜下，哲学激进主义者系统而全面地抨击保守主义政党的所有谬误，并最终在和平重建时期 (the re-establishment of peace) 赢得了自己的听众。

首先，他们抨击经济学上的谬误。每个生产者团体都要求国家保护以对抗国外的竞争；但是这种保护政策的结果却是所有消费者，也就是说所有国民无一例外地受到损害。这些团体的私人利益和国家的普遍利益发生了矛盾。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及其门徒——要求废除这种既愚蠢又复杂的政策，认为应牺牲团体的利益以满足普遍利益。工业





家早就放弃了对国家保护的要求，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政党的成员全部是土地所有者及其代理人。但是，新政治经济学以数学的精确性证明：自然法则（the laws of nature）的作用必然损害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而使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大发横财。功利主义改革派不主张没收土地，因为这种没收政策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增加，对他们来说，在所有的社团中，统治社团（governmental corporation）是最让人憎厌的。但他们确实要求政府通过一种极不公正的保护政策来制止地主享有的天然巨大利益的增长；政府应减少其经济职能以至于无，并把所有产品在所有人之间自由交易的观念传播至全世界。

其次，他们抨击那种可以被明确称为政治谬误的谬误。由于复杂政府与自由政府是同义词的思想，保守主义政党已成功地在英国获得了声誉。事实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复杂性是贵族特权而不是公众自由权的堡垒。如果选举体制（electoral regime）因普遍选举权制度而简化，且行政权力的所有持有者都紧紧依赖于议会，议会本身又紧紧依赖于多数人，那么就没有必要通过制度与程序的复杂性来保护个人自由权以反对行政权力的侵犯。既然行政权产生于最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它的决定就必然在总体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通过宪法和手续的简化，这些决定的作出应尽可能地简便快捷。当辉格党以自由政体的复杂性反对专制政体的简单性时，边沁学派的激进主义者也以民主政体的活力反对复杂的贵族政府的效率低下。

最后，他们抨击哲学上的谬误。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上的谬误是其他一切谬误的基础。按照边沁的说法，“情感的”特别是“禁欲主义的”道德是贵族政体的产物。那些教导以奉献为道德的人，那些规劝个人为了更高的理想牺牲其利益的人，那些毫无理由地以个人利益反对社会利益、好像社会除了是所有个人的集合以外什么都不是的人，准确地说，他们不是错误的受害者；而多少是有意地，已成为谬误的俘虏。作为统治社团的成员，他们迫使个人献身于这个社团的利益。

但是功利主义者向人们宣传的既不是服从也不是谦卑；而是通过对



人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利己主义的维护实现社会的总体繁荣。为了使人们确信这一点，功利主义才着手破坏传统哲学在理性和感性、责任和利益之间建立的二元论；正如理性是对感性进行整理的自然产物一样，道德秩序必然产生于利益的均衡。因此，正是由于边沁和詹姆斯·密尔的努力，道德和逻辑上的诡辩式的混乱逐渐消失了，哲学思想的简化为法律的简化准备了道路。

#### 注 释

[1] Bowering, vol.ii.p.379.

[2] Ibid.p.475.

# 第一章 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

将 1820 年前后英德两国哲学和科学舆论的状态作一对比是有意义的。在德国，形成公共舆论的思想家是哲学家，他们相信自己已发现了思考的综合形式，它比任何特殊训练都更全面，因此可以立刻满足精神的、感性的和理性的、想象的和现实的、宗教的和科学的所有需要。恰恰相反，在英国，公众眼中的思想家系统地选择了一种范围尽可能狭窄和具有排他性的观点：他们只从一个角度看人——作为经济社会的成员、作为财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他们致力于对经济类型的精确解释。这两种流派在法国都有热情的追随者。对德国的崇拜者维科特·科新（Victor Cousin）来说，德国是形而上学的故乡。对英国的崇拜者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 Say）来说，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除此之外，德国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还各在自己的内部进行争论；这些争论使维科特·科新和让-巴蒂斯特·萨伊感到失望；它们可能混淆对各方面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观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损害德国形而上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声誉。

在英国，经济学家发起了反对有关谷物进口的法律、航海法及整个关税保护和禁止制度的运动。直到和平重建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才勉强进入哲学家的狭小圈子。现在，经济科学的重大发现终于得到了公共舆论的公正对待：马尔萨斯（Malthus）和李嘉图被认为是与伟大的发明家阿克怀特（Arkwright）和史蒂芬森（Stevenson）同等重要的人类功臣和新时代的开创者。1816 年，马西特夫人（Mrs. Marcet）的《关于政

治经济学的对话》一书出版，其副标题题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通俗解释”，这本通俗读物立即获得了成功。1816年，政治经济学随布莱思（Prynm）进入剑桥大学；1818年随李嘉图进入议会；1825年随西尼尔（Senior）进入牛津大学。<sup>[1]</sup>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乐观主义者，在口头上，他们同意坚持利益的天然同一原理。但是，一方面，应如何解释这一原理呢？是更符合休谟精神的自然主义解释？还是更符合这一学派新趋势的理性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如何调和经济乐观主义的观点和马尔萨斯的意味着利益分歧增加的发现，即人口规律和地租理论呢？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人们迟早都要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的客观科学，这是徒劳的；事实上，他们现在就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1817年，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但他立刻发现马尔萨斯<sup>[2]</sup>和托伦斯（Torrens）<sup>[3]</sup>是他的理论对手而不是他曾经期望的支持者。接着，1821年，詹姆斯·密尔出版《政治经济学纲要》，1825年，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两部著作的相似性在于：它们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教科书，一门学科的一种解释，其作者都坚持全面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规律及其实际应用。詹姆斯·密尔——李嘉图的解释者，代表了哲学激进主义的经济学说。麦克库洛赫虽然并不属于这个学派，但在经济事务中他公开声明是李嘉图的门徒，是李嘉图理论的普及者和宣传者；正是在李嘉图理论系统化、通俗化、常识化的过程中，他代表了这些理论；职是之故，在李嘉图和詹姆斯·密尔之后，我们将对麦克库洛赫略加论述。<sup>[4]</sup>

## 1. 李嘉图

1818年，西斯蒙迪（Sismondi）访问了英国，当他返回欧洲大陆时，他被眼中的奇怪景象惊呆了。社会涣散，政治混乱，工业生产过度，人民陷入赤贫状态，除此之外，他毫无所见。制造商无视和平的重建，继续为发不出任何订单的市场生产；待遇低下的工人面对着成堆的无用财

富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与现实相反的是，他发现，在公众舆论中存在一种信以为真的经济学，这种学说除了要政府不作为外，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危机的措施，“它是如此思辨以致似乎完全脱离了实际”。<sup>[5]</sup>对他来说，李嘉图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新经济学流派的象征，他对其胜利谴责道：“总的来说他的体系的结论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对任何事务都没有害处；他的学说将科学如此简化以致使其离否认邪恶的存在只差一步之遥。”<sup>[6]</sup>这实际上是当前对李嘉图的书的观点；他的学说成了功利主义学派的正统，被认为代表着经济乐观主义和放任主义（quietism）的最完美形式。

由于他独特的思考个性——并不像人们最初误认为的那样过于简单，李嘉图是从两个出发点开始其研究工作的，考虑到这一点，如此评价他的经济哲学就是不正确的。通过对货币流通现象和银行券贬值的研究，1809年，他向公众展示了他作为理论家的能力；但是也正是在这些事务中，对演绎的和乐观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需求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被研究的现象在形式上是如此简单和抽象，因此似乎可以“在理论上”<sup>[7]</sup>从交换的一般条件演绎出其细节。如果银根均衡有时受到损害，那是由于政府过度发行纸币的错误；依靠极其精明的商人，尤其是熟悉世界市场形势的商人的谋利活动<sup>[8]</sup>，也许可以保持这一均衡正常而安全地建立，并确保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中产生天然的“需要”<sup>[9]</sup>，而且在所有人之间的“自由竞争”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永远保持同一”<sup>[10]</sup>。随后，1815年他集中研究了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无疑，他坚持认为这一亚当·斯密还毫无所知的理论没有对他曾捍卫的自由贸易理论造成任何伤害；但是他对政治经济学作了新的解释：它不再被认为是对“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而是对财富一旦产生，除交换外，在共同创造它的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方式的研究。<sup>[11]</sup>那么，这种分配方式是和谐的吗？它能按照平等对待参与分配的各阶级利益的法则实现吗？这似乎不是事实。再者，按李嘉图的设想，财富分配法则从基本的地租规律开始，来源于既是一个不和谐规律又是一个发展规律的人口规律。因此，对我们

来说似乎必须区分李嘉图经济哲学中的静态观点和动态观点。对于任何只考虑李嘉图静态交换规律的人来说，他的学说是乐观主义的，虽然由于李嘉图着手详细界定的许多干扰性影响，价值规律——它似乎证实了利益的天然同一原理（the principle of the natural identity of interests）——在其实际运用上是有限的。相反，对于任何只分析李嘉图动态的人口、地租、工资和利润规律的人来说，他的学说是相对悲观主义的，其理论基础最好应叫做利益的天然分歧原理（the principle of the natural divergence of interests）。

我们首先采取静态观点。经济利益的平衡被认为是通过交换建立的。用于交换的商品的起因和衡量标准是生产它们时所投入的劳动量。<sup>[12]</sup>因此，如果承认每个生产者的报酬是按照他所提供的劳动的比例给予的话，唯一需要的就是让交换不受限制地遵守决定它们的规律，使公平在经济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经济社会的自然法则就表现为公正的法则，而乐观主义似乎是真正的哲学。但是，由古典价值规律认可、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乐观主义绝不是绝对的。李嘉图是否也认为价值规律是完全正确的呢？我们将会看到，价值规律允许很多例外，但是为了他的科学证明的方便，李嘉图有意地以巧妙的方法忽略了这些例外。仅仅是由于理论解释的原因他才决定忽略这些例外吗？实际上，在他整个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证明商业交换自由的正当性这一令他全神贯注的现实问题。证据是，严格地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如果价值理论在任何论争中有损于自由贸易观点的胜利的话，李嘉图会立刻放弃这一理论以及使有可能建立这一理论的方法上的简化规则。

首先，规定产品的价值与生产它的劳动量成比例的规律不能说明一个纯粹乐观主义的经济社会概念。或许最好存在一个物质将为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快乐都不是按劳动的价格购买。李嘉图知道这一点，并在马尔萨斯为爱尔兰工人的懒惰而愤怒时提醒过他。李嘉图指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墨西哥黑人身上：“只需要极少的劳动，那里的土地就能生产出大量的香蕉、木薯、土豆和小麦，由于食物充足，又

没有对奢侈品的爱好，那里的人们享受着悠闲的特权。”但是应该因此而可怜他们吗？“幸福是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能非常肯定地说，如果吃得同样好的话，一个人享受悠闲不如享受整洁的房屋和漂亮的衣服幸福。”<sup>[13]</sup> 李嘉图也承认，最好有一个建设得像罗伯特·欧文梦想的社会主义村庄那样的世界，在那里，永远不会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限制生产和减少产品数量以增加产品的总价值。<sup>[14]</sup> 但在如此建构的经济社会里，一个人也许事实上拥有财富，却不知其价值；他也许拥有幸福，却不知衡量其幸福的标准。如果政治经济学要成为关于幸福的理性科学，就像在边沁制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它希望成为的那样，它必须根据劳动而不是效用来定义价值。J-B.萨伊 (J-B.Say)<sup>[15]</sup> 及其后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 希望直接从效用概念得出价值的概念。J-B.萨伊指出，不管人们的品味和需要如何多样，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对每一具体商品的效用的一般估价，这一估价也许是根据他们准备用来与之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而定的。如果 J-B.萨伊所说正确的话，举例说，当我发现人们通常准备用三顶帽子交换一件大衣时，我就可以断定，大衣的效用是帽子效用的三倍。但这混淆了使用价值——简称效用，和交换价值——从绝对意义上说，也称价值。因为一个在市场上具有价值的产品，必须具有效用，但就其本身而言这还不够：因为，J-B.萨伊自己问道，“当一个物品对一个人是必需品而对另一个人是多余的时，其效用应如何衡量？”<sup>[16]</sup> 衡量效用的唯一可能的客观尺度是每个人为获得商品准备提供的劳动量。

决定商品价格的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的竞争。一个对个人来说生产消费品的困难不断增加的个体社会 (a society of individuals)，总是严格地按照对他们来说一切事物表现为价值增加的程度而趋向于贫穷化。(在一个由个人构成的社会中，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困难在不断增加，每件东西对个人来讲所消耗的价值都在增大，随着这种程度的加深，这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会趋于降低) 简而言之，只有在按劳动痛苦的价格购买的情况下，效用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因此，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是乐观

主义的，但它的乐观主义既建立于其学说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又为其理性主义所限制。

但是，按照生产产品所用劳动量的比例确定产品价值的规律其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吗？根据经济现象的本质，李嘉图知道这一规律的运用所受到的限制。他在《原理》中写道，在很多情形下，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是能够正确说明其他商品价值变化的不变标准<sup>[17]</sup>。是哪些情形呢？在什么限制下才能说商品交换与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成比例才是正确的呢？总之是要问，在什么限制下实际的交换现象才能证明从抽象的交换规律推导出的经济学的乐观主义。

首先，李嘉图所说同等量的劳动是指相同时间的劳动。但是，劳动不是一个同质的量，它具有多种性质，举例说，宝石匠一天的劳动比计日工一天的劳动价值更大。是否应该说——就像亚当·斯密想要说的<sup>[18]</sup>——劳动量的计算必须把各种不同因素如劳动的难度和劳动者的技术考虑在内呢？但是这些因素与劳动时间不同，它们不能被客观地估价，在价值尺度的科学中它们不能被计算。为摆脱这一困难，李嘉图借用了亚当·斯密的另一研究，根据这一研究，工资标准一旦确定，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只能发生微小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多种劳动的相对估价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一匹毛呢的价值过去等于两匹亚麻布，现在等于四匹，这不是意味着织造毛呢所需的劳动已经增加，就意味着织造亚麻布所需要的劳动已经减少。然而，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之间存在分歧。亚当·斯密认为，工资标准在所有文明阶段明显保持相同；任何变化都是暂时的“革命”而不会超过“较长的时间”。<sup>[19]</sup>李嘉图更加小心谨慎。他写作于工业革命正开始改变经济世界的面貌，以及由于机器的广泛应用，在工业的各个领域改变工资标准的时期。他推测，对不同劳动量的相对估价总是“世代相传”近乎不变；最后，他坚持认为，即使有什么变化，其“逐年”变动也是微乎其微从而在“短时间”内对商品相对价值没有什么影响。<sup>[20]</sup>因此这就形成对一般价值理论的第一个限制：它正确地指出，随着劳动量的变化，产品的价值也会相应地发生同样的变



化，但是只有在对不同劳动的相对估价在不同时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如此。

但是还有第二个限制，它同样必要：一般价值理论不是对所有运人交换市场的商品都正确。稀缺商品——艺术品、古董、名牌葡萄酒——它们在数量上极其有限。既然根本不能假设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显然不能用生产它们时投入其中的劳动的强度来衡量其满足需要的程度。它们的价格被称为垄断价格，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竞争决定，并随着购买者的财富和品味发生不确定的变化。<sup>[21]</sup>简而言之，用劳动量衡量价值所必需的条件是：用于交换的商品应由劳动产生，通过劳动应可随意增加其数量而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

第二个限制仍然是不充分的。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价值理论不是对所有商品都正确，而且因为它对任何进入交换市场的商品都绝对不正确。由劳动量定义的商品的自然价值，是商品当前价格所要达到的界限并总是围绕着它上下波动。用李嘉图的话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各种商品的变动，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商品不断涨价的最高限度是与其生产所需的劳动追加值成比例的”。<sup>[22]</sup>至于事实上使实际价值区别于自然价值的波动的程度和时间，单凭经验就可以说明，其原因有二：首先，在研究供给与普通需求相比发生的变化的基础上不可能预测价格波动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有计算都是欺骗性的。太多的因素被包括进去了：该国的富裕或贫穷，它为了满足未来的需要保存多余产品的能力，或多或少关于未来供求状态的可能预测。<sup>[23]</sup>其次，不诉诸于经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详细说明在国家经济的每一部门中价格波动的持续时间。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一致依赖于供给可据以增加或减少的能力（facility），但这种能力是可变的。<sup>[24]</sup>

以“帽子、鞋子、谷物和布料”这些年年都消费和生产的商品为例，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认为需求收缩期和供给收缩期之间的间隔是一个短时间。<sup>[25]</sup>但对“黄金、房屋和劳动”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黄金流量的减少——它必然增加黄金的价值，只能缓慢地形成，通过减少产量





和储藏已铸货币，“黄金数量……将会在某一年稍微减少一些，另一年稍微多一些，最终其价值将提高”到希望的程度。再如减少房屋供给量以适应需求量的降低，这种减少只有通过现有房屋慢慢地倒塌才能达到。<sup>[26]</sup>最后，以劳动为例，像李嘉图那样把它理解为一种在市场上有价格的商品。为了增加劳动的供给量以将劳动价格恢复到其自然水平，〔假定已经成功〕就必须生养孩子并将其培养成为靠工资生活的人：这同样需要很多年的间隔。<sup>[27]</sup>对根据其花费的劳动量以自然比例交换的不同商品来说，原则上，交换必须是自由的，各个利己主义的个体必须有互相适应的能力。但是立法者的弃权不足以实现这些条件。为了使价值波动尽量微弱和短暂，个人，经济世界的原子，必须绝对地能动，必须能迅速地弄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根据其利益迅速行动。李嘉图认为他们不可能总是如此。人类的利己主义已经被“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他曾经达到过的财富水平的高度的愿望”深深地修改了；<sup>[28]</sup>通过减少经济机构的能动性，已养成的习惯制度延长了危机并推迟了在新的平衡状态下满足社会需要的时间。工人由于工资低于根据其先前习惯确定的最低水平而拒绝工做的事实也许会无限期地减少特定产品的供应量；资本家不愿转移其库存的事实也许使工业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sup>[29]</sup>另一方面，一些危机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既然劳动依赖于资本，在资本被固定的条件下，不牺牲在运转中不盈利的资本，就很难把它从一个经济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1815年战争后的危机就是如此。<sup>[30]</sup>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裕，从而机器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昂贵，这些危机也相应地更加严重。

因此，似乎是李嘉图经济乐观主义之基础的价值理论只有在大量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然而，为了理解李嘉图的学说在何种程度上才是乐观主义的，就应该估计以上列举的干扰性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掩盖了价值规律的运转。事实是，李嘉图总是倾向于忽视干扰性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在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进行估价时发生的变化是可以忽略的。当价值原理只对劳动量可无限增长的商品才是正确的时候，按他的观点，